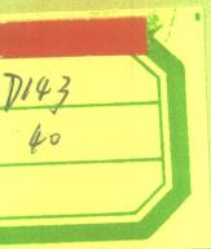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

党破产了吗？

亨利希·库诺著

（供批判用）



党破产了吗？

关于党内争论的公开意见

〔德〕亨利希·库诺著

韦任明译 史集校

本书是供批判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请核对原文，并
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Heinrich Cunow
PARTEI-ZUSAMMENBRUCH?
Ein offenes Wort zum inneren
Parteistreit

Verlag: Buchhandlung Vorwärts Paul
Singer G. m. b. H. (Hans Weber-Berlin)
Berlin 1915

根据柏林保尔·辛格前进出版公司一九一五年德文版译出

党 破 产 了 吗？

关于党内争论的公开意见

〔德〕亨利希·库诺著

韦任明译 史集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88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28,000 字
1977 年 10 月第 1 版 197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3002·184 定价 0.15 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者说明

本书作者亨利希·库诺(1862—1936)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狂热的社会帝国主义者。他从1898年起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编辑,1905年参加该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编辑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库诺最初支持《前进报》编辑部多数,反对议会党团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但很快就转到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列宁称他为“帝国主义和兼并政策的辩护士”(《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12页)。他自1917年至1923年继考茨基任《新时代》主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恶毒攻击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立即暴露了自己的叛徒面目,公开支持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了替他们的叛变变节行为辩护,库诺在大战第二年(即1915年)就抛出了《党破产了吗?》这本小册子。他妄言,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侵略战争是正当的,不能由此认为党已“破产”。为了赞美帝国主义,库诺别出心裁地编出了一套机会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写了《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光辉著作,在着重批判考茨基等“中派”的同时,也给了无耻的极右派库诺以致命的打击。

库诺在这本书中竭力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科学分析,硬说资本主义还有很强的生命力,“离终点还远得很”。他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说什么“当代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决不是最后的阶段”,

甚至说帝国主义是“前进了的、加强了了的资本主义”。他无耻地宣称，既然帝国主义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帝国主义就是无法“铲除”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斗争都是“荒谬的”，就象手工工人同机器大工业斗争一样“愚蠢”。这样，库诺得出了一个反动结论：任何革命都不仅是徒劳无益的，而且简直是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

列宁深刻揭露了库诺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反动实质，指出他的“理论”无非是一种笨拙而又无耻的推论：“帝国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所以帝国主义也是进步的，所以必须跪在帝国主义面前歌功颂德！”（《列宁选集》第2卷第2卷第812页）

库诺说，支持德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破产”，“破产”的只是那些“幻想”消灭帝国主义的人。但是，半个多世纪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证明，破产的正是库诺之流的修正主义分子。

本书是根据柏林保尔·辛格前进出版公司1915年德文版译出的。

1976年12月

目 录

一	思想和历史	1
二	资本主义破产了吗?	4
三	经济帝国主义是一个历史地必然的发展阶段吗?	10
四	关于发展的理论	18
五	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	22
六	理论上的混乱	33

一 思想和历史

3

反对我们议会党团去年8月4日和12月2日投票立场的活动,采取了越来越令人讨厌的形式。不同意议会党团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人,无疑有权进行批评——当然是客观的、党内同志式的批评,尽管他们自己在目前条件下也会认为,由于某种原因,最好是把这种批评推迟到战后去进行。但是,如果国内外反对者以懦弱、叛变、无原则、退却、破产等等罪名来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及其领导人,那就当然几乎谈不上什么客观的批评了。然而,我在此既不想驳斥那些激忿者喜欢采用的指责,也不想探讨表决问题本身。我认为更加重要得多的是首先指明所谓“德国社会民主党破产了!”这种改头换面地反复出现的论调的实质。这尤其是因为,据我看来,再没有比这个论调更明显地反映出德国党和外国党的战略家们在理论上,或更正确地说,在思想上的混乱了。

德国社会民主党破产了!为什么?如果人们去掉纯粹用来装扮这种论调的华丽辞藻,那么它的最后论据就原形毕露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辜负了我们(指责者)对它的期望,即它没有投票反对军事拨款,没有发起总罢工和群众性罢工,没有反对征兵,如此等等。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象我们原先所深信的那样,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周就惨遭破产;也没有随即发生人民起义和建立某种社会主义政权。至今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象我们原先所设想的样子。

一种奇特的逻辑——当指责者还要援引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时,这种逻辑就更加离奇了。因为社会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感到

失望，因为历史事件不是按照他们的思想发展，所以他们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破产了，再也不能把这个党看成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因素了。对于一个有些历史知识的政治家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试图从历史的条件和联系来掌握历史发展进程的历史理论家来说，当历史发展不同于他的预料和期望时，他就应该首先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我的这些期望有多少历史根据？我是否把一些发展因素估计错了？甚至是否完全过高地估计了今天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进步，从而使自己滋长了毫无根据的幻想？”

对于任何一个破产论者来说，只要他还具有历史观点，那么当其他参战国，如英国、法国、奥地利也同样使他们失望时，他就更有必要提出这些问题。然而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提出过这些问题，这一点十分清楚地说明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指责者没有从他们的期望、即他们的思想同历史事变不相符合的事实中得出他们的思想陷入歧途的结论；反而硬说，历史走上了不正确的道路。由此必然产生的推论是：不是政治思想应该以发展进程为准绳，并且在这种发展进程中检验与纠正自己；却恰恰相反，历史过程必须适应思想或政治幻想。尽管这些同志经常引用马克思的历史学说，但是，他们对基于唯物史观的论断，即和思想相比，历史永远是正确的这一论断，显然是根本没有理解它的意义。

实际上，人们可以说，全部政治发展史的道路是用美妙的幻想铺成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我们只要仔细地考察一下从十七和十八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起到今天，有哪些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奇特幻想此伏彼起，而所有这些向往又何等不符合实际的发展过程，那我们就必然会证实政治思想曾经遭到种种破产。这是完全不言而喻的，因为政治思想的情况，同法权思想和道德思想等等决没有什么不同。虽然总的来说，政治思想

是随着社会生活过程的发展而发展，但是，甚至最有才能的观察家和理论家，也总是只观察到社会现象的一小部分，特别是在今天存在世界性经济联系的时代更是如此。他在观察事物，特别是在观察新现象时，完全依靠估计和假设。因此甚至当一定的趋势可以为人们认识时，收获仍然很少。对这一事实，社会主义理论一直了解极少。因为社会的发展，不是一些平行发展的趋势在各自独特领域内发挥作用的结果，而是各种不同的趋势在各发展阶段上、不断地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互相制约和互相影响的结果。

此外，每一个人，包括最冷静的现实政治家，在他们判断自己周围世界的社会现象时，总是或多或少地受着感情冲动和个人意志与愿望的支配，一般来说，多情善感的人就更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从来不是单凭头脑，而是往往还凭情感来思考。要知道，⁶不仅存在着成见，而且也存在着既定的意志与愿望。

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不断产生错误的臆想；这种臆想在和平发展时期，虽然在细节方面也许会遭受各种冲击，但往往仍能长期保持存在，因为还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来证明它的幻想性。一旦社会生活突然发生变革和转变，这些臆想作为错觉和幻想的真面目便暴露无遗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判断发展进程时，也犯过各种各样的，甚至是根本的错误。这里只提这样一件事，那就是早在1849年，他们就有过这样的幻想，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成熟到可以建立“革命无产阶级的统治”并以此为开端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当1850年的革命低潮驳斥了他们的历史发展观时，他们——这正表明他们是真正的历史理论家——却没有要求历史应该驯服地适应他们的幻想，而是毅然决然地把历史事件看成是纠正他们思想的依据。1850年秋天，他们在《新莱茵报》上宣称，只有在新的经

济大危机到来之后才能指望出现新的革命^①。

他们认为，历史发展过程同样恰恰证明他们的看法只是幻想。恩格斯在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再版导言中非常明确地写道：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状况还远没有充分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扩展能力。”^②

7 这是应该受到普遍赞许的自我批评，因为恩格斯在这里率直地承认了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过高估计；这种过高估计，从今天的经验来看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人们试把1848年至1849年资本主义经济还不发达的初期状况同它今天高度发展的状况对比一下，那是侏儒对巨人。然而甚至象马克思这样的人当时也竟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已经成熟到能实行社会主义。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过高估计！

二 资本主义破产了吗？

对资本主义发展还存在着一种类似的过高的估计，据我看来，这种估计使我们很大一部分党的理论家，并通过他们思想上的影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4页。——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598页。着重号是库诺加的。——译者注

响使我们全党有一大批人抱有形形色色的幻想，并且今天仍然如此。认为资本主义确实早已破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人为地通过电疗法苟延残喘的这种看法，在许多党员同志中间简直成了教条。事实上，这种教条不仅是导致对最近时期政治事件的相当多的奇怪评价的根源，如把次要的选举成果或议会事件夸大为“世界转折”的象征、“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开端”的象征等等，而且也是导致我们自己队伍中相当多的策略上的错误决定和争吵的根源。因为坚信这一教条的人同认为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人相比，对于许多政治事件的看法当然是不同的，是比较乐观的，不仅如此，他在许多场合对某些策略措施的效力和益处也自然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党内屡次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作过高的估计，我的这一看法并不是从昨天或者前天才开始的，而是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本来可以从过去报纸上的文章、论战和书评等等中举出一大批这方面的证据来，不过我为《新时代》写过的那些文章无论如何也足够了。这些文章很容易查到，如果我在这里引用其中的几篇，那么这并不是为了象某些著名的榜样那样自夸：“你们看，我一直是这样说的！”我不会受这种渺小的虚荣心摆布。不过从前那些文章为我提供了手头的合适例子，我用这些例子可以很容易地说明，我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在我们党内占支配地位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程度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认为它是党内以往的和今天的相当多的幻想的根源。

当1896年塔加录人^①举行起义反对西班牙对菲律宾的统治的时候，我曾为《新时代》（第十五卷第一册）写过两篇论述《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殖民政策》的文章。我在第二篇文章的末尾补充说，日

① 居住在吕宋岛的主要民族。——译者注

本人吞并吕宋岛将使马来亚土著人民受到更深重的压迫，并且同时使日本的反欧趋势加强，而这种蒙古人式的扩张是不符合欧洲文化的利益的。

《新时代》编辑部持有不同的见解。它承认，对菲律宾的土著居民来说，西班牙的统治可能在目前是较小的祸害；但是日本在亚洲是一支革命的力量，它负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亚洲取得统治地位的使命。资本主义在亚洲每前进一步，就是“欧洲向社会主义前进了一步”。

我在《我们（自然是指我们社会党人）在东亚的利益》一文中作了回答。我在该文中声称：我之所以希望推迟资本主义进入东亚，并不是因为我想使当地人保持他们的比较安逸的生活方式。但是，强加于一个象吕宋马来亚人这样的民族的资本主义，是不能同欧洲那种“按照自然的发展顺序从历史上既定的经济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相比的。它完全是另一回事。

“到目前为止，凡是资本主义在亚洲得到了某种扩展的地方，那里的资本主义（下面要提到的一个例子除外）就是一种移植到外国的贫瘠的处女地上的、人工培植起来的植物，它在改变了的生长条件下绝不会象在欧洲的古老的文化土壤上完全一样地发育”。

9 那里的无产阶级群众，对资本主义的压迫倾向没有反应，那里既没有发生本地工人“具有阶级觉悟的反抗”，又没有发生争取“更高的生活条件”的努力。因而资本主义在那里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也不是向高一级发展的过渡阶段，而只是贫困化。我继续阐明说，尽管如此，如果在亚洲的群岛上人工培植资本主义能够推动西欧文明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那么这是无可反对的。但是从现在的经济关系来看，情况并不是这样。有关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但是，资本主义的胜利进军是不可阻挡的，它迟早也要进入今天仍旧落后的亚洲地区，而如果我们必须指望通过加速这一进

军来使西欧更快地向社会主义发展,那么,希望看到东亚尽早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敞开大门,这是绝对符合西欧无产阶级的利益的。然而只有当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确实已经衰竭,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前提条件已经创造出来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结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剥夺我们在亚洲的销售地区才有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要么破产要么实行社会主义。但是据我估计,我们目前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我们距离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点还相当远。生活在商业和工业的主要中心,眼看着生产的巨大增长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衰落,我们太容易低估我们和目标之间的距离和障碍。究竟在哪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自行破产达到了可以认为对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已经成熟的程度呢?英国没有,德国和法国更差,奥地利和意大利无疑是最差的。在后两个国家中,一部分真正的工业大生产才刚刚出现。况且社会主义生产并不能象沙漠中的绿洲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间的有限的局部地区成功地实现”。

我还阐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停留在低级发展阶段的亚洲地区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那么这对西欧来说,就不是意味着在“要么破产要么实行社会主义”之间二者择一了,而是首先意味着缩小某些欧洲工业部门在亚洲的销售市场,从而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地降低西欧大工业发展的速度。

我并不打算以此来驳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观点和马克思所假定的发展方向,而只是想驳斥流行于我们党内的那种观点,即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来说历史地必需的那一阶段。我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决不是最后的阶段。不如说我们是处在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时期,它恐怕还要持续几十年并且带来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我固然未能闭口不谈那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个别发展进程作了错误判断的看法,但是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

发展方向本身的认识是错误的,而是因为第一,他们还在上一世纪的七十年代就已经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屡次作了过高的估计;第二,他们把今后的发展过多地理解为迄今的经济方式的简单延续(较少理解为结构的变化),因而常常过分一般化地按照对过去形态的类比来判断新的形态。例如我认为,马克思就是这样过多地根据英国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国外市场的情况来判断世界销售市场和它的扩展能力。我认为,他的危机论的弊病主要在于,他是以英国当时的棉花危机的特征为依据的,而从那时以来钢铁工业越来越成为世界上特别重要的工业,这一工业不象棉纺工业那样提供直接消费的商品,而是首先提供生产资料,它是在和棉纺工业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把大股份公司的工业经营看作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最高形态,而今天在个别工业部门中托拉斯化和辛迪加化已日益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等等。

每个理论家,甚至马克思,他的结论只能来源于他所熟知的现象、他的经验,因此,这些在发展过程中插进来的、暂时还不能认识清楚的新成分总是或多或少地为人们所忽视。恩格斯的一些言论说明,他对于理论的这一缺陷也是十分清楚的。例如,他在上述给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感叹说:往往把一个经济发展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作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①变化。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也决不能表示赞同伯恩施坦在这以后不久发表的反崩溃论的文章。因为他不仅在其中主张资本主义仍未破产的见解,而是同时还拒绝马克思关于发展过程的观点,即所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2页。着重号是库诺加的。——译者注

崩溃论，在我同伯恩施坦论战的第三篇文章（《新时代》第17卷第1册第424页）中，我对我们之间的分歧当时是这样表述的：

“如果说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肯定远远超过伯恩施坦对它的估计，那么另一方面这一点也是无可辩驳的：积累决不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年代末所假设的和马克思甚至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还认为可以假设的那种高速度完成的。然而回顾迄今发展所经历的路程就可以证明，诊断不准的原因并不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趋势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而是在于他把当时的销售市场以及由它的局限性决定的特性也看成这些趋势未来的作用范围，并相应地把进一步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只看作在他眼前进行的过程的延续。

可见马克思的预断的错误的根源，在某些方面是在于他采用¹²了归纳法，把发展过程中某一个特定阶段内出现的经济趋势（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法则）的特有的影响普遍化，并且认为它在所有的阶段中都是固定不变的。而伯恩施坦的相反的观点也是由于同一种归纳法而得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这样把当时的‘世界市场’和由于消费地区的狭小而在生产力的迅速增长和市场的消费能力之间产生的矛盾看作是既定的东西，却不去研究当销路随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的增长也扩大和分化的时候，这一矛盾的影响是否有所变化。”

我认为伯恩施坦的阐述也包含着我所看到的马克思在理论上的错误——把未来看作现在的简单延续，不过把这一错误大大粗俗化了。在他看来，进一步的发展似乎仅仅是最近几十年中显露出来的经济形态的缓慢的延续，相反，在我看来这一经济形态却是暂时的东西，只是资本主义发展总过程中一个特定的历史片断，它即将为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新的发展时期所取代。在上述我的那篇文章的第425页上这样说：

“今天的经济状况的暂时性，特别是还在广大地区存在着的英国的垄断统治的暂时性，暴露得如此明显，人们几乎不得不故意闭上眼睛，才会得出这种看法，即认为未来的发展进程将和最近二十五年的进程一样。”

第 428 页又说：

“历史观点上的这一缺点，即仅仅拘泥于现在，这就是伯恩施坦的观点的基本错误。也是我们几乎所有主张资产阶级社会政策的人经过现实的深思熟虑的无事自扰的原因。尽管迄今全部的经济发展表明，在各个发展阶段上，除了一般的趋势以外，始终还存在着特殊的从属趋势，这些先生们还是把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简单地看作大约三十年来的经济运动走过的路线的延伸。”

13

三 经济帝国主义是一个历史地必然的发展阶段吗？

法国人兼并马达加斯加和得寸进尺地侵入北非，英国征服布阿尔人国家，胶洲湾的租借，美国同西班牙的殖民战争〔在这次战争中，美国不仅囊括了古巴和波多黎各，而且囊括了菲律宾和关岛（马利亚纳群岛）〕，壮大起来的渴望利润的金融资本日益迫切地追求新的有利的投资市场，这些立即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情况。新的金融资本时代带着狂暴的战斗叫嚣来到了，这一时代由于目前比较突出的殖民扩张意图而通常被称为“帝国主义时期”，而且随之而来的是比过去更加广泛、更加强烈的利益冲突的威胁。美国资产阶级在太平洋建立“星条旗”统治的企图，迟早必然会在那里导致同日本和英国的冲突（我在《新时代》第二卷第二册《美国在东亚的扩张政策》一文中详细地阐述过）。德国

和英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利益对抗也肯定会使两国在东半球发生一场大搏斗，因为英国资产阶级自然企图保持它的垄断地位。当然，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从来认为斗争会为了大的帝国主义目标而爆发，也许是为了瓜分非洲葡属殖民地和比属刚果，也许是为了金融资本对西亚的统治。至于萨拉热窝问题会成为战争的起因，以及这次战争会通过十分复杂的外交勾当（出于某些原因，我不打算用更尖锐的说法）而引起，我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因此，直到宣战前几天我都不能相信真正会由于这些原因而发生战争。这种斗争在我看来首先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无目的的插曲，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不应当通过赞同战争拨款而对此承担任何责任，——此后不久我才日益明确地认识到，英国资产阶级打算利用这次战争的有利时机，现在就进行从它的观点看来今后毕竟不能回避的大清算。

不过目前这还是次要的事。这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党内是怎样从理论上理解新的帝国主义的发展时期的？我不得不承认，我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论述：新的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同过去那些发展阶段例如机器大工业的形成一样，也是一个从资本主义的新的、内部的、金融的生存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发展时期，一个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不过是前进了的、加强了资本主义，现在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不再象从前那样是原来的工业资本，而是已经当权的金融资本。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不是偶然的東西，而是通向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必然阶段，那么“我们不应当容许帝国主义兴起；我们必须铲除它”的这一要求就同人们在机器大工业初期说这样的话一样愚蠢了：“不能容忍机器。我们要毁掉机器，而且我们要规定从今以后只许用手工业方式生产！”

今天相当多的人嘲笑说，那时有不少工人认为，通过毁掉机器